

● 中国历史

朱舜水治学理论初探*

覃 启 勋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覃启勋(1950-), 男, 土家族, 湖北长阳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日文化研究。

[摘 要] 朱舜水的治学理论重在讲究师道、重视为学和以作文验其所学。师道即为人之师须治学垂范, 以达“传道、授业、解惑”之目的。为学即讲究读书之原则与方法, 博览群书, 以进入治学之境界。以作文验其所学则是强调亲身实践, 以检验治学之效果。朱舜水的治学理论是我国古代学术园地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 朱舜水; 治学理论; 师道; 为学; 作文

[中图分类号] K 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4-0404-05

—

欲得治学之道, 必先重视师道。这是明清之际思想家朱舜水治学理论的第一要义。他严于律己, 率先垂范, 在授业实践中坚持“教之以事而喻诸德”的为师原则。与此同时, 还将这种原则的相关内容告诉学生, 使其懂得师道。关于这个问题, 可从他写给学生德川光国的以下启事帖中得到印证:

兹录《礼》一条奉览。《礼》:“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 少傅在后。入则有保, 出则有师, 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 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保也者, 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1](卷六, 第134-135页)

舜水在这里引用《礼》之所载“师、保”等事, 究其指归, 是向这位为人之君的学生说明:“喻诸德”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归诸道”, 而“归诸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想民众之所想, 急国家之所急, 这是为人之师的责任。因此, 舜水在被德川光国聘为宾师之后, 即引“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的诗文为喻, 进而申明“施者贵诚, 报者贵厚”之道理, 借以表明自己潜心执教, 辅佐光国, 敦促其“施惠加于百姓, 老者得所养而安, 少者有所长而怀……足其衣食, 革其故俗”。他认为, 光国如果照此而行, 那么, 其所治水户藩便会出现“人人在于覆戴之中, 人人胥庆, 水户一邦之人民, 子子孙孙, 歌颂如天之德, 垂之无穷”的兴旺景象^[1](卷六, 第115页)。此处所言之“事”, 就是教师应当传授的各种知识; 所言之“德”, 乃是教师所应传授的基本品行。这就说明: 治学并非易事, 讲究师道重要。师道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教师的言行举止均对学生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教师的全部工作就是使受业者晓事明德。所以, 学生获得知识学问乃至日后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有所建树, 与其就读期间遇到“教之以事而喻诸德”的老师有着直接关系。舜水认为: 德川光国是水户上公、一藩之主, 应该使其懂得择师标准。所以, 舜水在担任水户宾师期间, 发表了很多有关师道的精辟见解。他说, 为君者应“博选贤者以为之傅, 其次为之少傅”; 傅与少傅“必诚实端

正、寡言晓事、有学有识之人,方能成就储德。若徒好好先生而已,无益也”。为君者所以必重师或傅的遴选,是因为“软熟柔佞之人,最能害事”。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贤傅在于辅养君德,不在激许以自取名”。因此,舜水曾就此事提醒身为君的学生德川光国:“愿上公慎之!”在与光国讨论如何得到贤人的问题时,舜水告之:“夹带中有此人,则诚善矣;若夹带中无此人,则上公平日不留意贤才之过也。”^[1](卷六,第134-135页)这就是说,为师之道的本质决定于教师自身的素质。所以,不讲原则的人不能选为教师,柔佞害事的人不能选为教师,追名逐利的人同样不能选为教师!只有那些德才兼备、辅养君德的人方可选为教师。这是对光国的谆谆告诫,可谓落地有声,一字千钧!此外还应指出:舜水在谨事师道方面,做到了尽挚诚,尚严厉,不护短。正因为这样,他对某些学而不恭的学生提出了近乎苛刻的批评。大量材料说明,从其受业的学生,大都受到过他的批评。由是观之,严格要求又是舜水师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师之道与为学之道既对立也统一,教师于其中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

二

欲得治学之道,必先重视为学。这是舜水治学理论第二要义。为学,只是泛义上的读书学习;治学,则侧重于学问的探讨和专门研究。舜水认为:为学之道是治学之道的基础。他说:

为学非难,立志为难。志既坚定,则寒暑晦明,贫富夷险,升沉通塞均不足以夺之矣。如此而学有不成者乎?然学者,所以祈进者也,所以基大者也。而自以为进者恒退,自以为大者并其小而失之。……进寸退尺,学小遗大,即此欻然不自满之念,真善为学也,善立志也^[1](卷五,第86页)。

这里说的就是为学与立志的关系,不乏“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深意。为学,人人都可做到,但并非人人都能学成。学而无成或学而有成,主要取决于能否立志。善为学者,必定是善立志者,有志则事竟成。舜水作为师长,向来都望其弟子人人立志,个个成才。他早在长崎之时,便对开门弟子安东守约寄予过此类希望。他说:

两日连有人至,知贤契近日动定,甚喜。且询知尊人悦豫康宁,此人子之至乐。又闻邻境士至江户,皆称扬贤契之名,所谓显亲扬名也。前有江户僧人至,屡屡传说,亦俱如此。惟愿益加勉励,修身读书,为贵国开辟第一人,不佞亦藉手以与荣施矣^[1](卷七,第156页)。

舜水认为:善为学者必得知晓读书。读书是为了增加学问,如何读书本身也是不可多得的学问。在舜水丰富而精深的读书理论中,以史为鉴而纵论读书堪称特色。他在与奥村庸礼的笔谈中,就取三国故事而论证了读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昔吕蒙为石城长,吴主曾对吕说:“卿今当涂掌事,须当读书。”而吕蒙却辞以军中多务。吴主反问:“卿多务孰与孤?孤少暇即读书,自知开卷有益。孤非欲卿如博士应举,但不学而莅事,犹如面墙;义理违错,何由断决?”吕蒙于是折节读书。不久,吕蒙拜见鲁肃,言谈之间,鲁肃为吕的学问增长大感惊讶,因此而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士君子三日不见,便当刮目相待,君何见之晚也!”^[1](卷八,第256-257页)后来,吕蒙被鲁肃荐举于吴主,遂为大师。舜水列举这一历史事件,最直接的意图是勉励奥村庸礼效法吕蒙立志为学读书。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在阐明:读书不仅仅是文人书生的事,于当政掌权者而言,同样应懂得治学之道和学会读书。所以,他从吕蒙一事说开去,进而发表了以下平凡而又实在的具体看法:

第一,为什么要读书?他对奥村庸礼说:

今贤契职亲禄重,大用有日矣。又且年富力强,耳聪明目,而不及今为学,一旦参掌大政,机务填委,轻重狐疑,不能晓畅,岂不貽霍子孟、寇莱公之诮乎?古人云:“世间何物最益人神智?”曰:“无如读书。”然则读书非特修身、正行,适所益人神智也。汉光武投戈讲艺,息马论文,盖为此也^[1](卷八,第256-257页)。

如果将这段文字孤立地理解为对奥村一人而言,似尚欠当。因为舜水是在借这种特定的场合提出并回答问题:之所以要读书,是因为读书不仅能够修身、正行,而且能够益人神智。益,增加,增益;人,乃万物之灵;神智,精神智慧。既然读书能够使人的精神智慧得到增益,又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一个人不在年富力强、耳聪目明之时刻苦读书,日后就会成为一个机务填委、轻重狐疑和难得晓畅的糊涂虫。

第二,如何读书?舜水认为,读书之事存在一个如何读的问题。基础知识书籍是相应层次的人的必读书,不同的人可读不同的书,甚至不同年龄的人也可读不同的书。他说:

中年尚学,经义简奥难明,读之必生厌倦,不若读史之为愈也。《资治通鉴》文义肤浅,读之易晓,而于事情又近。日读一卷半卷,他日于事理吻合,世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由此而《国语》,而《左传》,皆史也,则义理渐通矣^[1](卷八,第256-257页)。

舜水于此所说的人到中年爱好学习,大可称扬。他特别推荐了浅显易懂的《资治通鉴》作为中年人读书方面的首选要籍。实际上,他在这里讲的,是个读书的方法问题:一是欲得进步,就要读些历史书籍。这一认定十分重要,它不仅为当时的日本授业者们指点迷津,而且能为今天的欲求上进者开启理性思维的大门。阅读史学载籍,并非历史学家的专利,学有所成的中年人,都应读些历史书,因为历史是人类自己的历史,是曩时人类知识的总汇和智慧的结晶。并且,所有的学科知识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如果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便能更好地观照现在,并科学地瞻望未来。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重视历史。历史知识匮乏,便会致人昏冥而无法开智;与之相反,学习历史知识,就能使人通达并成就其业。二是读书既要持之以恒,又要由浅入深。关于前者,他说读书应做到“日读一卷半卷”,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有所作为者,无一不是勤于读书之人。太史公“緹石室金匱之书”,写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正史。他不但本人喜好读书,而且还就秦始皇的读书事作了专门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2](第258页)当然,这里有反映始皇帝极尽专制集权之能事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皇帝,在批阅文书方面“衡石量书”,这种勤于阅览的作法无论怎样讲都是应该肯定的。至于由浅入深,舜水说得更是透彻:读书,只有持之以恒,才能产生兴趣。兴趣一旦产生,就会出现“愈好愈有味”的质的飞跃。在此基础上,由《资治通鉴》而《国语》,再由《国语》而《左传》。舜水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浅显易懂的编年体通史,先读它,可以从时间顺序上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这是一般的读法,是较浅层次的读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打基础的读法。但是,到了读《国语》乃至《左传》的时候,就比较专了。严格地讲,《国语》和《左传》是姊妹篇,其语事合璧,互为表里,构成了一部鲜活多彩的春秋断代史。正因为二者是断代史,故较之于《通鉴》所载的春秋历史,其内容更深更广。换句话说,他从《通鉴》说到《左传》,实则是在阐明由浅入深的读书道理。以研究历史的角度,仅读《通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所记载的只是时间顺序上的一般性历史事件。相对于此,读到了《左传》,便在治学方面找到了门径,因为《左传》作为反映春秋时代历史事件的重要典籍,上承先秦《诗》、《书》、《礼》、《易》、《春秋》之“五经”,下启西汉以降《史记》、《汉书》诸“正史”,这样一来,只要是治学之人,由浅入深,读及经传,就可收到触类旁通、游刃有余的特殊效果。这就是由史而经、下学上达的读书方法。

第三,读书须去其空疏,于国、于民、于事应有所助益。他说:

吟诗作赋,非学也,而弃日废时,必不可者也。“空梁作燕泥”,工则工矣,曾何益于治理!“僧推月下门”,覈则覈矣,曾何补于民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新则新矣,曾何当于事机!而且撚髭呕心,倘或不能工致,徒足供人指责,又何益于诗名^[1](卷八,第257页)

舜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遍览舜水文集,诗作的确甚少,仅有《遊仙诗》、《吴霞舟先生惠诗》、《漫兴》和《钱塘》,其篇目未过20,且均为写于国内的早期作品,载于张廷枚所撰《国朝姚江诗存》。其赋更少,只有《坚确赋》和《遊后乐园赋》两篇,前者插在其所撰写的《安南供役纪事》之中,而后者是在担任水户宫师期间应光国之遣游江户后乐园时所作。这说明舜水原本亦曾写诗作赋,但是,因为诗

赋往往追求豪华铺张而远离实理实学,功用不著,故而视为“非学”。舜水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而不赞成他的学生为创作诗赋费时劳神,诚如其言,即使写出了“空梁作燕泥”、“僧推月下门”、“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类的名言佳句,也很难说对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有多大助益。况且,为诗不工、作赋不精者,也会遭人指责。他认为其生徒弟子不应花费时日去写诗作赋,而应将更多的宝贵时光用在阅读古代切实有用的著名典籍和文章上,从而使读书之事益于治理、补于民事、当于事机。

第四,为学当做到能学。他说:

能学,则稠人群聚之时,必有我师;事务纷错之际,皆有其学。人人所能而我不能,则不劣而不得不学;人所不能而我独能,能则不广而益奋于为学,则无地非学也。彼自暴自弃之徒,日与其师相接,且不知其师之白黑青黄,岂能有益于学哉!^[1](卷五第283页)

就社会个体而言,知识的获得除了投身庠序授业于师之外,就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细心观察客观世界而主动获得。因此,不难理解舜水所讲的道理:欲得为学,须当做到能学。能学亦即善学。此虽是寻常道理,也很管用,但并非人人都可做到。其如善书之人,不仅能于斗室孜孜不倦地披阅甲金文字,勤奋不辍地临帖摹写,而且能于酒楼、店铺之门前檐下细细揣摩他人所书之招牌匾额,即便是踱步于街区闹市,亦未忘采集他人视而不见的一笔一画之优长。也就是说,凡善学者,都可得到学习机会,且都能够学到想学的知识。并且,善学者总是能够自觉地产生知识匮乏的紧迫感,无时不思及“人人所能而我不能,则不劣而不得不学;人所不能而我独能,能则不广而益奋于为学,则无地非学也”。与能学者相反,孤陋寡闻和学品见识肤薄的人,往往认为知识里手,傲慢自得,目空一切,最终成为自暴自弃之徒。这种人因无虚心之态度,又少能学之工夫,所以,即使是成天同老师(按:这里的老师实际上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老师,而是能使主体的知识得到增益的客观对象)接触,也不知道从其所学,因为这种人未对老师产生应有的最起码的认知,甚至连老师的“白黑青黄”都未了解,理所当然地不会有有益于学了。由此不难看出,舜水所倡的能学是一种理念、学养和境界,更是一种先存乎于心、后形之于外的治学品格。

三

欲得治学之道,必以作文验其所学。这是舜水治学理论第三要义。舜水在这方面有以下三大贡献:

其一,论证了作文基础。作文能够直接反映作者的读书效果,更能反映作者的治学规范和水准,易言之,所有反映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应视为作文之基础。因此,舜水对其特别重视。舜水在其开门弟子安东守约问及写作诗文之基础时,就发表过以下见解:

所贵乎儒者,修身之谓也。身既修矣,必博学以实之;学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不读书,则必不能作文;不能作文,虽学富五车,忠如比干,孝如伯奇、曾参,亦冥冥没没而已!……至于做诗,今诗不比古诗,无根之华藻,无益乎民风世教;而学者汲汲为之,不过取名干誉而已。即此一念,已不可入于圣贤大学之道,故程子曰:“为之大足丧志。”^[1](卷十一第394-395页)

作文基础是修身、博学。不读书,就不能作文;不能作文,即使学富五车,忠孝两全,也只会冥没无闻。至于他对做诗的看法,并不是在真正反对做诗,而是在批判其所见所闻的两类逆常的做诗现象:一类是做诗者对其无甚研究,就连风、讽之义,雅、颂所司都不知道,却做诗以孤芳自赏或自鸣得意;另一种则是以做诗为名,行取名干誉之实。这种人往往有政治投机和以“学问”示人的双重目的。不读书,则必不能作文,连作文的工夫都未掌握,又何谈做诗!庸碌无为,且不读书,必然不会作文做诗。这才是舜水所论的真正所指!欲得作文,必先通过读书而修身,而博学。

其二,申述了作文的标准和技巧。他在答小宅生顺问时便专门阐释了作文标准:

言者,心之声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则圣人之心亦不宣,非文则圣人之言亦不传。然文须通于天下,达于古今,方谓之文。若止一方之人自知之而已,则是方言调侃,非谓之文也!^[1]

(卷十一,第 408 页)。

舜水的作文标准不是那种“止一方之人自知之”的“方言调侃”,而是“通于天下,达于古今”的名篇佳作。为达到这个标准,他还强调了具体的写作技巧。他说:

文章之贵,立格立意,练气练神。常山之蛇,处处皆应,节节俱灵,真文之神品也。若踞高山绝顶,俯瞰万物,则遣辞命意,自然超旷^[1](卷九 第 298 页)。

“立格立意,练气练神”的为文技巧非常关键。其要务是使文章关涉世道人心,即使是小小题目也应体现独到见识,使之出人虑表。如果只是摛辞绘句,虽复脍炙人口,正如春苑之华,鲜妍易谢。同时,他还指出,写文章,务必使字字句句,俱从经史古文中来,而又不免其痕迹;水乳相和,一气冲融,如蜂之酿蜜,蜜成不复辨其为何花之英;要能自开手眼,使《六经》皆供为文者驱策,而不能专讲摹某人某作,仿某人某句;应路头醇正,气势冲沛,著力研磨,深造其极。与此同时,作文切忌佶屈聱牙,以文害义。

三是结合实际,指导学生属文撰稿。舜水在传授文章的写作基础、标准和技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站在实理实学的立场指导了学生属文撰稿的具体操作和实践。他告诫学生:文章得力在几句,或一段,或两段。其铺叙处,本非切要。若几句肯綮,便有千钧之力,或止在掉尾一句。若以家常茶饭,平平铺叙,不足于发其光,适足于掩其美。由此不难看出,他对学生的文章写作要求甚高。事实说明,学生的作品只要经其所见,便必有修改褒贬。五十川刚伯算是他的得意门生,据《燕台风雅》和《大日本名人辞书》记载,该生从学之前,就于延宝三年五月被加州侯赐为儒官,赐岁禄三百石。但是,其从学于舜水之后,所呈文件就得到了舜水的认真批阅和改正。

综上所述,朱舜水的治学理论是讲究师道、重视为学和以作文验其所学。师道要求为人之师在治学方面率先垂范,以达到“传道、授业、解惑”之目的。为学就是讲究读书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博览群书打好基础,进而拾阶登堂,以进入治学的境界。以作文验其所学则是在强调亲身实践,通过实践检验学习效果,从而掌握治学之道。所以,舜水的治学理论是对治学规律和方法的科学总结,因而是我国古代学术园地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参 考 文 献]

- [1] 朱谦之. 朱舜水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司马迁. 史记·秦始皇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ZHU Shun-shui's Theory of Meticulous Scholarship

QIN Qi-xu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QIN Qi-xun (1950-),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Sino-Japanese cultures.

Abstract: ZHU Shun-shui's theory of meticulous scholarship stressed on teaching morals, learning and practising. Teaching morals means as a teacher to be a model of scholarship. Learning mean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thods of reading and then well-read. Practising means to test the result of learning through practice.

Key words: ZHU Shun-shui; meticulous scholarship; teaching morals; learning; practice